

毕生勤奋读书著述的钱基博教授

吴 忠 匡

无锡钱子泉先生，名基博，字子泉，号潜庐（1887——1957），是我国上一代蜚声学术界的著名学者之一。钱先生的一生是勤奋自学、不倦著述的一生，也是勤奋教学、不倦培养后辈的一生。在他四十初度前夕所写的《自传》中，自谓“生平无营求，淡嗜欲而勤于所职，暇则读书，虽寝食不辍。讲评孜孜以摩诸生，穷年累月，不肯自暇逸”（《光华大学半月刊》三卷八期），自是先生治学与教学生涯的忠实记录。

先生自少年时代起就从事学术活动，十六岁在当时梁启超主编的进步论坛《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四万余言的《中国舆地大势论》，又在爱国志士刘光汉、黄节所创办的《国粹学报》发表了评论古今文章流变利钝的长篇论著《说文》。在长达五十余年的著述生涯中，先生著作等身，对经、史、子、集四部要籍都有专门论著。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期，先生见梁启超先生所著《〈论语〉〈孟子〉（附〈大学〉〈中庸〉〈孝经〉及其他）解题及其读法》，意有异同，别纂为篇。梁先生不以为忤，曾赞扬“钱先生在《清华周刊》发表的《〈论语〉解题及其读法》之类的撰述”，称说他“也要鞭策自己在较近期内对于别的要籍再做些与此同类的工作”（《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自序》）。先生这一方面的述作，就有《周易》、《四书》、《老》、《庄》、《名家五子（尹文子、邓析子、慎子、惠子、

公孙龙子)》、《离骚》、《古诗十九首》、《文心雕龙》、《诗品》、《文史通义》、《古文辞类纂》等的解题、疏证、读法之类的多种论著，就其学术渊源、编次体例、文章流别、版本源流、研究方法以及在后世的流传，后人的考订、校勘，综理钩稽，考述极为详备。自谓本所知识，讲论古籍，指导后学，于义固无所逊让云。

先生湛深经学。鉴于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叙次经学源流，每多疏舛，不尽惬人意；清儒江藩绍述其旨著《国朝经义目录》，以清学承汉学，而于唐宋经学置之不论不议，心所未安。于是著《经学通志》一书，以阐述经学古今之流变。先生讲授经学，兼宗汉宋，不尚门户意气之争。他认为清代汉学之盛，而弊端亦于焉而生，盖其专事考求古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实“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巨”（《古籍举要》）。因盛推番禺陈澧，谓其所著《东塾读书记》为能熔汉宋于一炉而救汉学琐碎之弊，瓣香所在，因署其著书之室曰后东塾云。

中年以后，先生专治集部，积极从事古文学评论和文学史方面的研究。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韩愈志》、《韩愈文读》、《明代文学》、《江汉炳灵文谈》、《清人集别录》等。尤以《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为规模宏大，篇幅最巨。尝自谓：“近人侈言文学史，而于名家集作深刻之探讨者卒鲜。予读古今人诗文集最伙，何啻数千家，而写有提要者，且不下五百家，唐以前略尽。严氏《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邑人丁氏《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及清修《全唐诗》、《全唐文》，通读一过，人有论评，而于其人之刻有专集者，必取以校勘篇章，著录异同。儿子钟书能承家学，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以章氏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发凡起例，得未曾有！每叹世有知言，异日得予父子日记，取其中之有系集部者，董理为篇，乃知予父子集部之

学，当继嘉定钱氏之史学以后先昭映，非夸语也（《读清人集别录》）。”盖先生自其青少年时期，就酷嗜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文史通义》，钻研玩味，到老不渝，曾谓刘知几的《史通》，章氏的《文史通义》，“千载相望，骈称绝作”。《现代中国文学史》和先生晚年所著《中国文学史》正是先生在通读古今专集的基础上抉发文心，剖析源流，高挹群言，自出手眼的两部大著作。

《现代中国文学史》阐述中国文学兴衰得失的递变轨迹，剖析作品中的人物和现实之间的紧密关系，穷源竟委，援据纷纭，自成一家之言。深刻地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学术界新旧交替时期剧烈的思想矛盾和时代的苦闷。诸如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王闿运、严复、康有为、梁启超、陈三立、朱孝臧、王国维、章炳麟、刘师培、林纾、章士钊、胡适等，先生依据他们的经历，详著作品观点的来龙去脉与生活基础，鉴定作品的理论背景，一一纳入历史评述的范围，肯定了激进思想的进步作用，鞭挞入理地指斥了封建顽固分子的偏狭、固执和保守，因此，作者的爱憎情感是显而易见的。有关一代文人的遗闻轶事，可作为知人论世之资的，也都予以网罗，粲然可观。今天的学者如能展读先生的遗著，必定会懂得凡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社会制度及其上层建筑，最终必然要通过革命被另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所替代。这对我们了解过去学术思想的发展，展望未来，还是很有意义的。正如先生自己所评说的：“读者以此一帙为现代文人之忏悔录可也”。这说明先生的著述，对当时的学界起到了一种不可或缺的深刻反思的作用。它无疑是今天研究我国近代文学历史发展和了解那一时代政治、社会思想心理等方面的历史风貌的一部重要史料。此书自一九三〇年出版以后，五年之中曾四次再版。台湾于一九六六年编辑出版《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将此书收入一九七四年的《续刊》中。据悉，此书已由湖南岳麓书社出版。

《中国文学史》是先生晚年的论著，本着继承、发展的观点，博学周览，涵咏辞章，着重考察历代文章的利病与其升降得失的历史根源；在评论历代文学理论与作品的同时，运用排比综合的方法，作通上下、前后、平行和纵直的研讨，于同中求异，于异中见同，来揭示文学演变的轨迹，使文学史研究达到了较高深度和广度。先生在书中对我国数千年来传统的文艺批评所产生的大量文谈、诗词曲赋话、书论、画说、工艺等，也多有所介绍和评述，涉及面较广，为今天的文艺学和文学史家提供了有益的资料和启示。此书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先生在学术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对于群经、诸子、古史地学、古典文学理论，无不淹通，造诣深湛，为学界所钦服。他治学和著述的主要特色是以经诂经，以子治子，旁涉百家，相互勘证，一文一字，无不钩稽详核，援证博而推阐精。他的学术思想和他的观点体系，给学者的感觉是纯真、朴实、清新，情味醇厚。当然，由于时代不同，其学术观点与研究方法都带有过去时代的特点，对于今天的学者，也许需要多花一些力气去进行探索和研究，才能理解这些著述的要义和本旨。

先生先后任教北京清华大学、无锡国学专门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光华大学、杭州浙江大学、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武昌华中大学。全国解放后，任教华中师范学院，直至寿终。

先生生长在中国多难的最黑暗时期，他和旧时代一些有良心而向往有所贡献的学者一样，苦志读书，治国学，以文章著述为经世的大业，用以兴起民志，尽匹夫兴亡之责。抗战军兴，日寇占领我国东南半壁，先生不顾个人病弱之躯，毅然随浙江大学迁徙江西泰和。他在浙大同仁刊物《国命旬刊》的发刊词中，引述顾炎武“士大夫无耻，是谓国耻”，大声疾呼：“救亡图存，岂异人任！”这是一篇极其激越慷慨的文字，满腔忧国伤时之心，跃然纸上。于是，又重检少年时期的习武图强的志趣，开始谈兵，

他和浙大顾谷宜教授合作，从俄文本翻译了《德国兵家克老山维兹（现译“克劳塞维茨”）兵法精义》。一九三八年，先生转移湖南安化县的国立师范学院，虽病痛日增，而讲学无倦容。每举湘中先贤语，思欲以“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要求从学者“困心衡虑，动心忍性，以忧患增其智慧，决不以忧患丧其志气”。一九三九年，先生应国民党抗日干部训练班教育长李默庵将军之请，赴南岳讲说《孙子兵法》。先生分析当时日本侵略军的情势时，即印证孙子语：“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坚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断定日本在战略战术上都已处于劣势；我国抗战虽旷日持久，若能“强而避之”，“以待敌之可胜”，而不轻吾力以犯其锋，以伺敌之瑕而承其敝，必能获取最后胜利（见《孙子章句训义·序言》）。这次讲话，对于当时国民党地区大后方有志抗日的爱国人士，由于节节败退所引起的对国家民族命运的不安和苦闷，无异是一服兴奋剂。先生熟于山川形势险要，中外古今用兵战守攻取成败得失之迹，于是酌古论今，以成《孙子章句训义》（解放前夕，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稍后又撰《兵学演变史论》。

一九四四年，长沙、湘潭、湘乡、邵阳相继失守，寇军长驱深入我腹地，风警频传，师范学院由安化西迁溆浦。先生义愤填膺，自请留守，欲以身殉。他为当地的《湖南日报》连续撰写讨论战局的文字，他建议：倘在安化置一师兵，配合外围兵势以控制湘中，如曾涤生之驻祁门，祇须按兵不动，则邵阳之敌，北进西上，皆受牵制，而地形阻绝，又一时无从取安化，扼吭拊背，看似呆着，其实活势。上说下教，强聒而不舍。先生当时曾给我信说：“我自念赴院未必能为学院有所尽力，不如留此以慰各方父老之意，非寇退危解，不赴院召，亦使人知学府中人尚有人站得起也。”“我留此岂能真有造于一方，不过藉此练胆练智以自验所学，无负余生而已矣。”事后，又给我信说：“此番坚持不动，

亦欲动心忍性，自家作一试验，不意侥幸以免于难。从前读书有会，经此一番体验，乃更进一层认识。”这是先生生命史上最见肝胆、锐志献身、爱国意识强烈焕发的重要一页，表现了那个时代中极少数正直知识分子的极可矜贵的气节和傲岸精神。对于先生当年的志节和勇气，作为他的一个学生和历史的见证人，我至今怀有深切的敬意。

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倡议编纂中国教育全书，特请先生承担其中的东林书院、东林党、顾宪成、高攀龙四个专题。先生有复教育部长函，对此评议说：

基博粗解文史，自当竭所知能，以效绵薄。惟以东林书院、东林党、顾宪成、高攀龙四题见委，则殊非所愿。东林学风，声气结纳以为标榜，党同伐异以持门户，而义理不以飭躬行，问学不以经世用，适承今日学风之极敝，徒以长标榜虚夸之习。基博不愿以乡曲之私而缠为张目也。顾宪成所见极浅，高攀龙却真实有造诣，把持得此心住，然就今日而言理学，与其讲高攀龙，不如讲陆世仪，精微不如而切实过之，切实可以救虚夸，精微不免流游谈也。明末以遗老为大儒者，李二曲学究气，独善其身，术不足以经国；黄黎洲名士气，言之不作，行不足以持躬；而王船山槁饿穷山，苦节卓行，又嫌杂博不精，靡有统纪。惟陆世仪、顾炎武两人明体达用，有本有末，而又淡泊明志，不事驰骛。顾炎武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可以见汉儒之真；陆世仪义理悦心，兵农济世，可以匡宋儒之偏。私心淑艾，窃愿景行。今日士风已偷，师道不立，无事则酣秦，闻警则张皇，不惟无勇，抑且无智。古人以忧患动心忍性，今人以忧患幸生失志，平日所谈文章道德，一旦大难当头，无一字一句得力，大师失其所以为表，后生不知所以为学！明亡尽有老儒无拳无勇以不能为国干城，而有勇气以延颈受刃，安之若素者。此次抗战并此等人士而无之。大敌未来，学府先空，见之丧气，言之恫心。大部持掌邦教，所见不

如是耶！安得顾、陆其人，生于今日，树之风声，以立懦廉顽！而所见诸家传志序跋，未有谦心贵当以阐二先生学问之大而窥其真者，如以相委，不敢逃役。

发愤一吐，辞气激扬，借古以讽，感慨系之。

先生读书至博，文采甚丰，每读一书，辄有提要、别录。平生所为诗古文辞，以及交游往还，论学论文书札，也都有记录，存诸日记中。其日记体例一如李越缦、王壬秋日记。这绵历五六十年，总计五百余大册的《潜庐日记》，竟于十年浩劫中全部被查抄，被焚毁，这是我国文化学术史上的一笔无可弥补的损失！是我国学林的大厄！郁绝斯作，吁可痛哉！

先生藏书甚富，其中仅中国古兵法一藏，自谓“搜辑至七八十种”，尝与湖南曹典球先生书：“此事将成绝学，欲撰提要以抉微，而卒卒未暇。”这是先生的未竟之志。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国际地位日隆，国内安定，民生安居而乐业，致力建设，百废俱兴，先生常喜形于色。因董理所藏书二百余箱，计五万余册，捐赠华中师院图书馆。诸铜玉陶瓷古器、古币等文物大小数百件，移赠该院历史系。其所藏碑帖字画一千余件，则赠与当时苏南文物管理委员会。又方志一千余种，赠与江苏泰伯文献馆。

先生的一生，谨严方正，待人诚挚笃厚，对后学督教甚严，令人有不怒而威的庄重感。然而即之也温，诲人不倦，不断给后辈以父师的温暖。为人和治学，像先生这样洁白纯粹、辉光日新的人物，是我平生所仅见的。

先生的一生，为古文史研究付出了难以估量的耕耘劳动，遗著篇幅浩繁，涉及面广，对学者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指导线索，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把先生给学术界留下的丰富遗产流传下去，这就成了后学者责无旁贷的重任了。

作者工作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